

中美戰略競爭加劇背景下韓國的對沖 偏好研究

South Korea's Hedging Preference under the Back-round of China-US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姜龍範

天津外國語大學國別與區域研究院

jianglongfan1960@126.com

金可

天津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院

壹、引言

出於中國不斷崛起以及美國對自身霸權衰落的挽回，美國對華遏制不斷升級，中美戰略競爭逐漸加劇，已演變為全領域與多維度的大戰略博弈。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一直將印太地區錨定為中美戰略博弈的核心場域，提出並推進印太戰略的實施與強化，其目的在於聯合域內盟友及夥伴國家遏制中國崛起，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國要求韓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配合其遏華政策，但由於印太戰略孤立和圍堵中國的意圖日益明顯，加重了韓國立場選擇的難度，韓國國內對此展現出對沖偏好的階段性調整。未來韓國的外交靈活性如何發展演變仍然存在著諸多變數，更加系統、深入分析韓國對外政策軌跡以及

內在機理，有利於加強對韓國外交政策的理解。在美國加大對華競爭的背景下，密切關注周邊國家國內政治的走向，有利於穩定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本文嘗試在既有之對沖理論研究基礎上，構建韓國在中美之間對沖偏好的理論框架，設法確定影響韓國對沖偏好之體系因素與單元因素，瞭解其發揮作用的完整機制，以韓國對美國印太戰略的因應作為案例，探討韓國在中美間的對沖偏好轉變規律，從更深層次理解當下韓國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趨冷，並逐漸向印太戰略轉移的原因。

貳、韓國在中美之間對沖偏好理論框架

對沖（Hedging）是國家面對在大國間選邊的困境時，避免在制衡、追隨或中立等立場鮮明行為中做出選擇並承擔風險時，採取的一種戰略模糊手段。國家行為體的對沖行為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策略組合，混合追隨、接觸、束縛、防範、牽制、綏靖等合作性、強制性、模糊性工具，國家可以採取具有抵消效果的不同政策，在規避風險的同時獲取利益。從韓國面對中美大國競爭的處境來看，其對沖行為不僅表現為儘量在中美間保持模糊立場（平衡性對沖），也體現為在特定議題下對美、對華採取相反立場（追隨性對沖），該情況下一般呈現對美追隨、對華「離心」態勢。

韓國的對沖行為呈現上述偏好變化的影響因素，包括體系因素和單元因素兩個層面。體系因素即結構壓力，表現為中美競爭壓力及美國對韓施加壓力對行為體的影響程度。進入 21 世紀以後，中國的崛起令美國出於霸權護持的目的開始調整競爭策略，兩國關係經歷「接觸與遏制」階段以及「全面遏制與戰略防禦」階段，目前則

進入「全面競爭與戰略相持」階段，整體態勢由包容性競爭轉向對抗性競爭，演變為兩國關於國際主導權和稀缺資源配置主導權的博弈。中美競爭壓力加大的表現之一，即美國對韓施壓強度增大。在韓美同盟這一不對稱同盟框架內，韓國在安全、貿易等多重領域對美依賴，當美國需要盟友加入對華戰略競爭隊伍時，上述因素成為美國拉攏韓國的籌碼。受中美競爭壓力的影響，韓國不得不採取有利於規避選邊風險的對沖戰略。隨著大國競爭力加劇並試圖相互平衡，韓國對沖空間越發受到擠壓。

其次，單元因素即戰略認知，包括國家對外威脅認知、決策層認知和戰略重心認知。國家對外威脅認知即韓國對朝、對華威脅認知。自朝核危機爆發至今，國家安全問題一直是韓國制定對外政策的首要條件。朝核問題久而未決，半島局勢日趨緊張，促使韓國著重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和本國參與國際事務意願的提升，韓國開始對本國地位提升受阻、中國建立霸權意圖等問題產生危機，在對沖戰略光譜中偏向於自認為更有能力說明自身提升地區影響力的美國。對外威脅認知的強化驅使韓國在安全和經濟議題下向美靠攏。決策層認知體現為政黨政治影響下不同陣營決策者對周邊國家的認知。

根據當前情勢，中美戰略競爭正在衝破朝鮮半島地區的傳統博弈態勢，朝鮮（核）問題在區域格局中日趨稱為「常量」，中美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競爭日趨聚焦於韓國，本質上圍繞地緣經濟安全展開。中美博弈重心的改變，促使韓國戰略重心由傳統安全轉向經濟安全。在朝核問題的解決進程中，中美兩國均扮演重要角色，而隨著中國的科技與產業發展，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與韓國產品企業形成激烈競爭，韓國國內出現「韓中經濟競爭性大於互補性」的

判斷，主張與美國進一步加大產業整合，推進對華科技、經濟領域的「脫鉤」。

總體來看，體系因素重在解釋國家選擇對沖行為的原因及對沖空間的限度，但難以揭示對沖的特殊情境，相對地，單元因素的複合作用對於韓國對沖偏好的階段性調整具有重要作用。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往往依託於國際和國內兩層環境之下，體系因素與單元因素的密切聯繫性和整體作用性應該得到重視，共同應用於相關理論框架的構建中。

因此，本文嘗試構建如下理論框架（如下圖 1），用於解釋近期韓國在中美間的對沖偏好變化規律與機制，具體表現為國家行為體對於結構壓力的傳導作用加以理解，從而得出不同戰略認知，以認知為基礎制定對外政策，對外政策服務於其戰略認知，對外政策產生的國際影響對結構壓力起到調節作用，整體機制完成閉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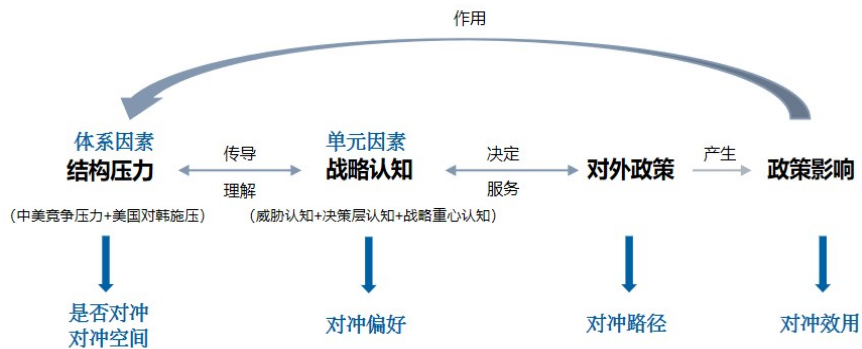


圖 1：韓國在中美之間對沖偏好理論框架

參、印太戰略框架下文在寅政府的平衡性對沖

從體系因素來看，中美兩國互動的對抗程度是衡量兩國戰略競爭強度的指標。2017年，此時中美戰略競爭尚處於「全面遏制與戰略防禦」階段，印太戰略也仍在計畫和政策討論階段，還未正式實施，體系壓力的鬆緩給予韓國在中美間實行對沖的適度空間。後期直到印太戰略正式實施，美國迫使韓國給予明確意見和交代，韓國才開始考慮本國戰略與印太戰略的有限對接。

從單元因素來看，文在寅政府的戰略認知促使其在中美間實行平衡性對沖：（1）文在寅上台後希望通過溫和方式推進南北和解合作和朝鮮半島無核化，以達成朝韓「和平共存」與「共同繁榮」的目標。2018年，朝韓和美朝關係大幅緩和，成為朝韓雙方確定和平共處和長期合作的有益嘗試。另外，出於中國在半島問題進程中之重要角色與中韓經貿合作的「壓艙石」作用，修復因「薩德」問題造成損害的中韓關係、恢復中韓經貿正常往來成為文在寅政府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總體而言，文在寅政府的對朝、對華威脅認知相對弱化。（2）作為進步政府，文在寅重視韓美同盟重要性，但更加重視自身發展，不希望過度強化韓美同盟，使韓國成為美國在安全領域的全球「小夥伴」，此一意識形態基礎同樣對上述威脅認知產生影響，文在寅將朝鮮視作民族和解夥伴，對華表示信任且重視對華關係，在中美之間戰略立場不易出現對美傾斜現象。（3）文在寅執政時期，國內面臨因「薩德」部署造成朝韓關係緊張與中韓關係惡化背景，朴槿惠彈劾案也引發韓國民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文在寅必須提出緩和朝鮮半島安全局勢、修復中韓經貿關係恢復的有效方案，尋求民眾對新政府的支持，穩固其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對於文在寅政府而言，上述方案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協助。

肆、印太戰略框架下尹錫悅政府的追隨性對沖

從體系因素來看，2021年1月拜登上台後繼承並強化特朗普對華競爭戰略，十分注重對華競爭戰略合作中的盟友角色。2022年5月，拜登開啟亞洲之行，希望鞏固與韓日等國家間盟友關係，加強軍事安全和經濟安保合作，吸引其加入「印太經濟框架」。拜登此行打破慣例，在訪日之前先行訪韓，極力拉攏韓國姿態明顯。上述舉措明確的對華「排他性」和對韓吸引力使其對沖空間受到擠壓，被迫在中美間選邊站隊。

從單元因素來看，尹錫悅政府的戰略認知促使其在中美間實行追隨性對沖：(1) 尹錫悅對朝政策以施壓為主，上台後提出「大膽計畫」但未能得到朝鮮積極回應。朝鮮長期堅持「以強對強」的對外政策立場，面對韓國的強硬政策，朝鮮的挑釁動作從未間斷，從而進一步刺激韓國對朝威脅認知；另外，尹錫悅認為中國國力持續崛起將阻礙其建立「樞紐國家」的戰略願景，是追求地區霸權、重建地區秩序的先發表現。與文在寅相比，尹錫悅政府的對朝與對華威脅認知相對加強。(2) 作為保守政府，尹錫悅主張強化韓美同盟並追隨美國，習慣將朝鮮視為威脅，對華存在偏見與不信任，認為中國在半島問題進程中無法發揮切實作用，尤其在安全議題下對美採取「戰略傾斜」立場。(3) 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令韓國在支柱產業領域失去優勢，尹錫悅希望在經濟方面避免對華過度依賴，將外交基調從「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轉變為「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世界」。拜登政府促進印太國家與歐盟國家加強經貿合作、減輕對華經濟依賴的政策導向對韓具有顯著吸引力。

與文在寅政府相比，尹錫悅政府並非被動參與印太戰略，對美一味追隨，而是在積極融入美國戰略的同時，立足於本國利益謀求

中韓新型關係的構建，試圖以印太戰略作為槓桿調節中韓關係，改變文在寅時期所謂「屈辱外交」，使兩國以平等、尊重的前提實現交往。2022年12月，韓國首度提出其印太戰略，即《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內容並未跟隨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腳步將中國渲染為「威脅」或「挑戰」，而是明確指出「中國是實現印太地區繁榮與和平的主要合作國家，韓國將立足國際規則，以相互尊重和互惠為基礎謀求共同利益，達成更加健康、成熟的中韓關係」。因此，韓國在積極參與印太戰略的同時依然注重中國態度，積極尋求中方理解並避免觸及中方敏感問題。韓國總統府高官也表示，韓版印太戰略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包容」，不會排除中韓合作。

國家實行對沖行為的目的在於規避風險和獲取利益，尹錫悅政府向美傾斜有利於規避在中美之間選邊的風險，而注重中韓關係的發展空間則是韓國追求國家利益的體現。今後，韓國大概率將以自身印太戰略為外交戰略重心，在進一步將本國印太戰略與美國戰略對接的同時繼續謀求中韓關係的「底色」轉變。

伍、結論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發展與強化，美國印太戰略逐步升級，進一步加強對華遏制。韓國作為夾在中美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在同盟機制與戰略夥伴關係的約束下，陷入選邊站隊的困境，在中美之間實行對沖行為的空間受到壓縮，而韓國戰略認知綜合影響其中美對沖偏好的變化規律。

面對美國印太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文在寅政府出於對外威脅認知弱化、決策者認知趨向進步化、戰略重心仍停留於朝鮮半島安全議題，對印太戰略的態度從既不排斥也不重視，轉變為謹慎且有限

地參與，以「重經濟、輕安全」的合作基調推動「新南方政策」與印太戰略的對接，同時重視中韓關係修復和發展，在中美間堅持不偏不倚的平衡性對沖。尹錫悅政府出於對外威脅認知加強、決策者認知趨向保守化、戰略重心由傳統安全演變為經濟安全，一改文在寅政府謹慎態度，面對美國「拉韓反華」行為呈現迎合態度，積極參與印太戰略下的不同議題合作，雖依舊重視中韓關係但總體立場強硬，在中美間秉承向美傾斜的追隨性對沖。總體來說，韓國在中美之間的立場從平衡性對沖轉變為明顯靠攏單一大國。